

# 我国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 演进逻辑与生态重构路径

◎黄小宇 冯攀静

**【摘要】**社区教育话语体系是由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实践话语与传播话语构成的动态系统,其结构形态深刻反映了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与价值取向。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历史谱系,识别出其演进历经了行政赋权的肇始、项目驱动的探索、多元参与的深化及耦合共生的构建四个阶段,呈现出从“国家单一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商”的演变逻辑。然而,当前该话语体系仍面临主体结构失衡、内容供给脱节、传播渠道阻滞等生态危机。为此,新时代的生态重构亟需从理论自觉、主体赋权、内容共创与传播融合等维度系统推进,以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充满内在活力且能够有效赋能社会治理的良性社区教育话语生态。

**【关键词】**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生态重构;动态系统

**【作者简介】**黄小宇(1991-),男,江苏开放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课程教学、数智教育、社区教育;(通讯作者)冯攀静(1995-),女,江苏开放大学助教,研究方向:教育管理、教师发展、社区教育。(江苏南京 210036)

**【基金项目】**2024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社会教育(社科普及)专项课题“生成式AI驱动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4SJA-25);2025年度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重点课题“开放大学赋能低龄老年人后职业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SS-B-2025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使之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有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sup>[1]</sup>。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sup>[2]</sup>。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教育在构筑终身教育体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及完善社会治理结构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因此,从话语体系层面深入审视社区教育,不仅是推动其自身科学化、专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亦是响应国家战略、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

然而,纵览既有研究,学界多聚焦于社区教育的政策演进脉络、区域实践模式或具体课程实施,对其

内在的话语结构、权力关系及系统生态则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注与批判性反思。事实上,话语体系绝非现实被动的“传声筒”,它通过定义概念、设定议程、分配资源,深刻地形塑着实践的边界与样貌,本身就是一种能动的“建构性力量”。社区教育的话语格局,清晰地映射了国家、社会与个体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互动关系与权力博弈。当前,社区教育领域存在的居民参与度不高、供需错位、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其深层症结之一便在于话语体系的结构失衡——各话语主体权能不对等,不同话语形态间存在壁垒,未能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机生态。

鉴于此,本文引入“话语生态”这一分析视角,将社区教育话语体系视为一个由政策、学术、实践与传播等要素构成的、动态演进的复杂系统。遵循“历史回溯—现实审视—未来建构”的逻辑理路,首先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演进谱系,揭示其从“国家单一主导”到“多元主体协商”的演变逻辑,进而诊断当前话语生态中存在的失衡与阻滞。最终,立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宏观背景,提出一个系统性、生态性的重构路径。期望能突破社区教育研究中“重行轻言”的局限,为理解社区教育发展的深层动力与制约因素提供分析框架,并推动其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化贡献具有建设性的解题思路。

### 一、社区教育话语及话语体系的理论廓清:生态分析的视角

#### (一)社区教育话语:作为权力与实践的建构性力量

在语言学领域,话语由语言和言语两部分组成。语言是话语的物质部分,言语是话语的精神部分<sup>[3]</sup>。笼统而言,话语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表述与阐述,其构建在话语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基础之上,并依托于特定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在不同的语境下,各异的话语主体从不同视角形成了多样的话语表述。如今,话语已成为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理论的阐述都离不开话语的描述和解释。将这一概念置于社区教育领域,社区教育话语可被定义为:在社区教育这一特定社会实践场域中,不同行动者(如政府、学者、实践者、居民等)用以表达其对该领域的认知、价值、功能与范畴的理解时所运用的一整套概念、范畴、表述方式和叙事逻辑。这些表述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谈论和实践社区教育的“语言世界”。

然而,若分析仅止步于此,便无法触及话语的本质。借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话语并非中性的交流工具,而是一种深嵌着权力关系的社会实践。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产物和载体,同时也是权力争夺的对象;它通过定义“真理”和“知识”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完成权力的微观运作。将此理论视角投射于社区教育场域,可以发现社区教育中话语权的分配,直接决定了何种知识被认定为“合法”、居民何种学习需求被“看见”,以及哪类主体拥有对社区教育的“定义权”。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政策话语凭借其行政权威和资源分配能力,在话语竞争中占据支配地位,这使得社区教育的官方定义、发展目标与优先事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权力的话语化”过程。其他主体的话语,如居民的切身需求或实践者的地方性知识,则可能因此被边缘化。因此,对社区教育话语的分析,本质上是对其背后权力关系与知识建构机制的批判性考察。

#### (二)社区教育话语体系: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

单一的话语形态尚不足以构成体系。话语体系是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部表现形式,旨在传达特定的价值观和思想观点。社区教育话语体系,是指在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不同主体基于相异立场与逻辑所创造的各种话语形态,经过互动、博弈与融合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构成物,其结构映射了特定时期社区教育领域的权力格局与价值共识。当代中国社区教育话语体系主要由四种核心话语形态构成:其一,政策话语植根于政治逻辑,体现国家意志与顶层设计,

具有强制性、规范性与导向性;其二,学术话语遵循学科逻辑,追求理论的科学与系统性,为社区教育提供学理支撑,但也面临与实践脱节的风险;其三,实践话语源于实践逻辑,形成于基层操作情境,富于灵活性、草根性与生命力;其四,传播话语遵从大众逻辑,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侧重于通过通俗化、情感化的方式实现有效沟通与广泛动员。

这四种话语形态并非彼此孤立,它们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社区教育的话语生态。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并非某一话语的独白,而是多元话语的和谐共鸣与协商对话。该生态的健康与否,取决于几个关键要素的互动状态:主体的参与度,即政府、学界、实践者与居民等各类主体能否平等、有效地发声;内容的共生性,指不同话语所倡导的知识与价值能否相互借鉴、融合创新,而非彼此排斥或隔绝;传播的交互性,关乎话语的流动是单向灌输还是双向乃至多向的互动沟通;以及评价的导向性,即评价标准是鼓励多元价值的实现,还是强化单一的行政导向。

总之,社区教育话语体系是由政策、学术、实践、传播四大话语形态构成,并在特定权力结构中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对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历史回溯,即是对这一生态系统演进历程与内在动力的剖析;而最终的生态重构,则旨在优化其系统功能、促进要素间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索。

### 二、社区教育话语变迁的阶段特征

回溯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其话语体系的演变并非线性累积,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不同话语主体间权力关系动态调整与重构的过程。依据话语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可将其划分为以下四个特征鲜明的阶段。

#### (一)行政赋权与话语的肇始:作为学校教育补充的“他者”

我国社区教育话语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处于萌芽阶段,其最核心的特征是话语权高度集中于政府行政力量,社区教育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呈现出对正规学校教育的强烈“依附性”。在“自上而下”的行政赋权模式下,社区教育并非独立形态,而是作为加强“中小学德育”的辅助工具登上历史舞台。其开端以1986年上海市真如中学建立“社会教育委员会”为实践先声,并在1988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这一中央文件中首次获得政策性表述。此时,政府作为近乎唯一的话语主体,垄断了对社区教育目标、任务与范畴的定义权,决定了社区教育“为何”与“何为”,使其在话语空间上沦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与“他者”。

与此同时,社区教育的其他话语形态开始酝酿,但尚未形成有效互动。在学术层面,受西方理论影响,以梁春涛《中国社区教育导论》(1993)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致力于从学理上界定社区教育,将其理解为“教育社会一体化”的组织体制,为学术话语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实践层面,基层探索虽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并影响了政策话语的形成,但总体上仍是在政策划定的框架内进行。然而,政策、学术与实践这三种话语形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与脱节:学术话语超前于本土政策设计,实践话语则被动响应行政指令,而作为服务对象的社区居民,其话语权则近乎空白,这深刻揭示了此阶段话语权力结构的单一性与初始性。

#### (二)项目驱动与话语的独立:实验区模式下的“政策—实践”闭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我国社区教育话语体系进入了以项目驱动为核心的“独立化”阶段,其话语权力结构呈现出典型的“政策—实践”闭环特征。这一阶段的标志是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了“积极进行社区教育试点”的工作任务<sup>[4]</sup>,首次将“社区教育”作为独立概念提出,使其从中小学德育的附属框架中正式剥离。随后,以《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2001年)等政策为纲领<sup>[5]</sup>,国家通过建立“实验区”与“示范区”的项目制治理模

式,自上而下地划定了社区教育的实践疆域并注入资源。此举使得政策话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驱动与规制力量,而基层的实践话语则在响应政策号召、完成实验任务的过程中被极大地激发和具体化,二者形成了“政策驱动实践,实践验证政策”的紧密闭环,共同构成了此阶段社区教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然而,这一看似高效的闭环系统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尽管学术话语在本阶段取得了显著进展,如厉以贤等学者认为社区教育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sup>[6]</sup>。学者李少元等人认为,农村社区教育是对农村社区内共同生活的人群组合所进行的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广泛的社会教育组成的“大教育”<sup>[7]</sup>。黄云龙用生活教育理论构建社区教育的科学基础是社区教育发展及社区教育科学化的需要<sup>[8]</sup>。虽然对社区教育定义的深化,以及研究视野向农村社区教育、生活教育理论等学科基础的拓展,但其总体上仍处于“政策—实践”闭环的“外围”。学术研究未能深度介入并有效挑战以行政效率为主导的运行逻辑,与政策、实践领域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并行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在此技术治理框架下,社区居民虽被视为服务的对象,但其作为能动主体的话语权并未得到真正确立,他们更多地是被动员和管理的客体,而非能够平等参与议程设置的共建者。这深刻揭示了该阶段话语权力在走向独立的同时,其结构仍具有相当的封闭性与不平衡性。

### (三)理念拓展与话语的多元:终身教育视野下的内容扩张

21世纪初至2015年,在“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等宏观元话语的引领下,我国社区教育话语体系进入了以“理念拓展”为标志的新阶段,其话语格局开始突破单一的行政主导,呈现出“有限多元”的复杂态势。政策层面,《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sup>[9]</sup>将社区教育明确纳入国家终身教育体系的战略规划,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将其学科归属定位于继续教育范畴,从顶层设计上极大地拓展了社区教育的合法性空间。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依据本地实际出台相应法规,推动了政策话语的地方化与具体化。

在国家政策文件的引领下,各地政府纷纷制定相关法规,以促进社区教育的发展。例如,2001年上海市出台的《关于加强本市社区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努力把上海建成适应时代要求的“学习型城市”和“实施市民终身教育行动计划”的工作任务;2003年浙江省颁布《关于大力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的意见》则强调,营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人人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环境,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这些具有地区特色的政策文件,不仅为各地区的社区教育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也为我国整体社区教育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背景下,学术话语随之勃兴,以《社区教育原理》《社区教育学》为代表的一批专著着力构建学科体系,并开始触及社区教育的民族性等深层理论议题,标志着学术自觉的初步觉醒。虽然这些著作并未专门论述社区教育话语内涵,但隐含了某些话语元素,为开展话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在《21世纪初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叶忠海开展了社区教育的民族性研究,赋予社区教育话语的民族属性,拓展了社区教育发展的民族空间,指出社区教育体系必须形成整体优化的社会共识和舆论环境<sup>[10]</sup>。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多元繁荣”并未从根本上重塑话语权力的深层结构。尽管政策与学术话语获得了空前发展,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也获得了一定的表述空间,但多元主体间并未形成有效的对话与协商机制。政策话语通过设定范畴与归属,依然主导着发展的基本框架;学术话语虽日趋活跃,但在反哺政策制定、引领实践创新方面仍显乏力,与政策、实践领域存在明显的断裂。尤为关键的是,作为社区教育服务核心的居民,其真实的、个性化的实践话语与学习需求,在强大的政策规划与学术建构面前依然微弱,难以有效转化为影响课程设置与资源分配的决定性力量。此阶段的话语体系,在内容扩张的同

时,仍延续着一种结构性的不对称。

### (四)治理转向与话语的耦合: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生态初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深化,社区教育话语体系迎来了以“治理转向”为标志的“耦合共生”新阶段。此阶段的核心驱动力源于政策话语的根本性演进:从传统的“管理”逻辑转向现代的“治理”逻辑。以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2016年)为代表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强调“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并从法律层面通过《成都市社区教育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予以保障,这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空间与制度基础。在政策引领下,学术话语开始积极回应实践关切,聚焦于“社区营造”“终身学习话语权”等前沿议题,试图从学理上阐释并引导社区教育的复杂实践,如吴海红和郭圣莉(2018)提出,社区营造话语是社区治理的新话语,主体由政府、社会和市场等组成,其话语需要分析各主体方逻辑、话语自身的逻辑以及耦合机制<sup>[11]</sup>。王海平(2019)提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话语概念,从承担机构和配套制度方面分析了其话语的演变遵循从分工、失范到整合的社会发展逻辑<sup>[12]</sup>。而实践话语则在区域差异化发展中展现出丰富样态,如东部推动城乡一体化、中部服务经济建设、西部支持基础教育,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在此背景下,一个初步的、动态的话语生态开始显现。各类话语形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织与耦合态势:政策话语通过法治化与地方化实践为整体生态划定框架;学术话语通过理论创新为生态注入反思性与前瞻性;而以微信、抖音为代表的传播话语则凭借其交互性与平民化特征,技术性地打破了传统单向传播的权力结构,为居民直接表达诉求、参与互动提供了平台,极大地激活了草根层面的话语活力。然而,尽管理想中多元话语和谐共鸣的良性生态已初现雏形,话语权力结构呈现出从单向支配迈向复杂互动的重要转向,但各话语主体间的权能配置、对话机制与共识凝聚仍面临挑战,这意味着一个成熟、稳定、高效的话语生态系统仍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构建与完善。

## 三、生态重构: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未来路径

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同步于其话语的发展与演变。面对当前社区教育话语体系在主体、内容、传播与评价等维度上的结构性失衡,零敲碎打的修补已不足以应对其内在的生态危机。因此,必须从生态学的整体性、关联性与动态性原则出发,紧密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对社区教育话语体系进行系统性、生成性的重构,以期培育一个主体多元、内容共生、传播互动、评价科学的良性话语生态。

### (一)价值根基的重塑:从权力话语到价值引领

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重构,首先需要夯实其价值根基,实现政治话语的功能性升维。当前话语体系面临的价值导向模糊问题,根源在于政治话语过多停留在行政指令和资源分配的“权力话语”层面,而未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新时代背景下,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教育领域的任务,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此,必须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动政治话语从单纯的“权力话语”向凝聚社会共识、阐明发展方向、提供意义支撑的“价值话语”转变。

这一转变要求我们强化社区教育研究的理论自觉,通过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教育智慧、西方社区教育的先进理念以及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生动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区教育基础理论。社区教育的视野应当超越传统局限,将其纳入终身教育体系的宏大框架中,成为连接个人学习与社会发展的桥梁,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并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价值重塑将使政治话语在保持政策规范性的同时,更具思想引领力和文化感召力,为整个话语生态提供坚实的价值基座。

## (二) 知识体系的创新:从理论悬浮到实践扎根

与价值重塑相呼应的是知识体系的创新。当前社区教育领域存在学术话语“悬浮于实践之上”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原创性理论匮乏、学科边界模糊、建制意识薄弱。话语体系与学术体系紧密相连,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坚实的基础之上。为破解这一困境,必须推动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实现知识生产的根本性变革。学术研究需要摒弃对政策文本的简单注释和对西方理论的生硬套用,转而深度沉入社区教育的“生活世界”。这就要求研究者立足于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与社区治理等核心理念,同时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教育思想的深厚底蕴,广泛吸纳国外社区教育的先进经验。核心任务在于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建立双向互动的知识生产机制:一方面推动“实践的理论化”,对基层探索中的草根智慧进行系统提炼,形成本土化的知识命题;另一方面推动“理论的实践化”,让抽象的学术概念在具体情境中接受检验和迭代。这种扎根实践的知识创新,将构建一个既能深刻解释现实又能有效指导实践的学术话语体系。

## (三) 主体关系的重构:从单向赋权到多元共生

在夯实价值与知识根基的同时,必须对话语主体关系进行重构。当前居民等基层主体话语权微弱的现状,反映了话语体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平衡。基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文化特征以及居民需求的差异性,社区教育实践必然呈现出多元化样态。这使得主体赋权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地方特色。主体赋权需要超越形式上的“考虑”,通过制度化设计确保多元主体实质性参与。这包括建立常态化的居民需求表达机制(如社区学习议事会、线上提案平台)、参与决策机制(如在课程设置、项目评估中享有投票权)以及效果评价机制(如将居民满意度作为核心绩效指标)。在构建实践话语体系时,既要确保政府意志的贯彻落实,又要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充分满足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更重要的是,要体现社区教育的公平性,促进所有社区居民以主体身份积极融入,从而构建涵盖政府、社会各界和居民的多元主体话语体系。

与主体赋权相辅相成的是传播话语的重构。针对居民关注度不高、参与积极性不足的“百人怪圈”现象,必须重塑传播话语生态。社区学校“百人怪圈”现象普遍存在,有研究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社会各界对社区教育知之甚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缺少社会各界能够理解和表达的社区教育传播话语<sup>[13]</sup>。这要求超越简单的“讲好社区故事”层面,构建以居民为中心、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具备反馈与响应机制的传播生态。通过将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从单一信息发布渠道升级为集资源推送、意见征集、互动交流、社群营造于一体的多功能节点,使传播的本质从“宣传”转变为“对话”与“关系构建”,从而增强社区教育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渗透力。

## (四) 系统协同的优化:从机械叠加到有机循环

适切的社区教育话语体系应由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实践话语及传播话语共同构建。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重构有赖于各话语形态的系统协同。理想的话语生态并非政策、学术、实践、传播四种话语的机械叠加,而是一个能够持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动态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策话语提供价值导向与制度保障,学术话语提供知识供给与批判反思,实践话语提供问题来源与效果检验,传播话语提供互动场域与关系纽带。这种系统协同要求我们避免因政治话语的强势主导或实践话语的丰富多样而导致的结构失衡,同时警惕学术话语缺失与传播话语滞后带来的系统瓶颈。各话语形态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输入输出和反馈调节机制,形成螺旋上升的迭代过程。打破话语壁垒,实现知识的循环增值与权力的共享共治,是构建良性生态循环的终极目标。这种有机协同的生态系统,不仅能够促进社区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更能有效推动其社会治理与人的发展功能的实现。

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清晰地呈现了从行政赋权到多元耦合的转型轨迹,其发展逻辑深植

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教育改革的宏观进程之中。通过回溯社区教育话语体系四十余年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其从依附于学校教育的“他者”身份,历经项目驱动的独立化探索、终身教育理念引领下的多元拓展,直至当前治理转向下的生态初现,展现出从单一主体支配到多元主体协商的演进趋势。这一历程不仅反映了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持续深化,更映射了国家、社会与个体在社区治理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动态调整。

当前,构建良性社区教育话语生态已成为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对主体结构失衡、内容供给脱节、传播渠道阻滞等现实困境,必须以系统思维推进话语体系的生态重构:通过价值重塑实现政治话语的功能升维,使其从行政指令的“权力话语”转向价值引领的“意义话语”;通过知识创新强化学术话语的实践根基,构建扎根中国大地的理论体系;通过主体赋权激发实践话语的内在活力,建立多元参与的体制机制;通过媒介融合重构传播话语的互动网络,形成双向沟通的传播生态。

展望未来,社区教育话语体系的建设应当立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研究者需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与学术担当,在深入剖析话语互动规律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共生、动态平衡、富有生命力的社区教育话语生态系统。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教育质量、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唯有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社区教育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中的独特价值。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时事报告,2016,(06).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03).
- [4]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7050/199604/t19960410\\_77143.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7050/199604/t19960410_77143.html),1996.
- [5]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0004/t20000427\\_16515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0004/t20000427_165158.html),2000.
- [6]厉以贤.社区教育·终身教育·学习社会[J].中国成人教育,2001,(11).
- [7]李少元,李继星,赵北志,等.农村社区教育的问题与改进建议[J].教育研究,1999,(09).
- [8]黄云龙.用生活教育理论构建社区教育的科学基础.教育管理研究,1996,(01).
- [9]国务院.国务院批转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687.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687.htm),2008.
- [10]叶忠海.社区教育实验工作20年:成就、特色和展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22).
- [11]吴海红,郭圣莉.从社区建设到社区营造: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逻辑和话语变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02).
- [12]王海平.从分工到整合: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政策的话语演变[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6).
- [13]汪国新,项秉健.社区教育的根本性变革:从设计型到生长型的转变[J].教育发展研究,2019,(09).

责任编辑:王松国